

论东西方文化价值哲学观念的殊异与融通

——兼谈时代青年人生价值观念之嬗变和定位

戴生岐

(长安大学 人文社科部, 陕西 西安 710064)

摘要: 对东西方文化价值哲学进行比较研究是时代青年构建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念的理论前提。中国一个多世纪的现代化历程的教训昭示我们: 致力于人的主体性的现代化, 构建适应社会现代化要求的人的价值观念, 必须坚持“综合创新”、“全面发展”、“工具理性”三大方法论原则。中国的传统价值哲学的主旨在于“做人”; 西方的传统价值哲学的主旨在于“谋事”。在“和平”、“发展”潮流占据主导地位的今天, 通过“跨文化沟通”以消除历史误会, 从而达到“双赢”, 已成为东西方有识之士的共识。所以, 只有学贯中西, 坚持走文化会通之路, 才能构建起开启历史喜剧、迎接新世纪挑战的正确的人生价值哲学观念。

关键词: 文化价值哲学; 天人相分; 天人合一; 文化会通

中图分类号: G04 **文献标识码:** A

On Differences and Exchanges of Philosophy Concept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 Value

DAI Sheng-qí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China)

Abstract Comparing the philosophy value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 is the theoretical premises for modern young people to build up a correct point of view. After more than a century, what China experienced in its modernization reveals that we must insist on “synthesize innovation”,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nd “instrument nous” as to modernizing the concept of people as main part and building up proper viewpoint for modern people. The substance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value philosophy is “how to behave”, but that of western society is “how to do”. Now the “peace” and “development” are the leading position, it is the common view to eastern and western to estimate historical misunderstanding through “culture communicating with each other” to achieve “double-win”. Only one has studied much knowledge of China and West and persisted in culture communicating, can he set up a right value of life for turning on comedy of history and receiving challenge in the new century.

Key words culture value philosophy; differences between man and universe; man being an integral part of nature; culture understanding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的时代,从总体上讲,属于社会大转型的时代。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江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

中已明确指出,就中国社会而言,九大发展过程是显而易见的^[1]。“过程是存在与非存在的统一”^[2]。从其中所揭示的内涵讲,既有人所涉身的社会生活的大转型,也有人的自身文化心态与价值观念的大转型。

通过转型,原来有的事物消失了,原来没有的事物产生了,在这样一个“静悄悄的革命”中,我们每个人都会惊喜地发现,某一天早上醒来,发现我们都已经或多或少地完成了自身主体性的自我扬弃,而迈入了新的境地。据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分析,当前中国人价值观上的某种扬弃与内心深处的痛苦、迷惘、困惑,并不总是消极的、破坏性的,或者说正是这种开放心灵下的非平衡心态所昭示的某种“无序”,正是未来新有序心态构建前的必要的源头与准备。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奠基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徐特立先生对“无序”化的“心态”早在延安时期就有明智的看法。他认为“青年需要向各方面发展,应该保持他天真活泼进取的态度永远不衰。一切固定性、偏执性、早熟性都是不应有的”。他像老子一样也看重“水”。认为水为“无规定者”,为“混沌”,流水不定。徐老认为,青年人头脑“混沌”一些正是创造性到来的契机,因此他大声疾呼,要“思想解放”。他认为青年人与其“思想顽固,还不如思想混乱较妙”,与其“少年老成,还不如少年荒唐较好”^[3]。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实现科学的观念更新呢?为此,就得明了当前的时代主题。总的来说,就国内讲,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的主题。在这个主题下,人的主体性的构建,尤其是人的价值观念的更新就不能不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汲取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二是,要汲取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来自于西方,因而,就不能不了解她的理论背景与西方人的价值观;同时,中国特色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表现,因而就不能不了解中国传统的价值观。所以,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提出的“古今中外法”所体现出的综合创新法,应该是人的价值观念构建的第一方法。应该指出,价值观念的更新是一个人发展的最重要契机。我们说的解放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人的价值观念的变革与定位。同时,价值是一个关系范畴,发生在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中。抽象地说,价值是客体属性对主体需要的满足与肯定。主体需要有各种各样,从人的心理结构分析,主要有三种需要:一是理性认知需要;二是道德意志需要;三是审美感情需要。后二者又可以合成人的非理性需要。相对于这三种需要,人们的价值创造也可以分为三种范型:即理性知识的创造,伦理道德形象的展示,审美对象的生成。在当代中国,时代青年人的价值追求应该注意以下两点:其一是从“全面发展”的要求出发,在价值观念的构建上体现圆满性。因为人们毕竟

是在社会主义环境下构建人的价值观的。所以,主体性上价值观的构建就应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人的价值活动有三种类型,即求真、致善和审美。一个知识丰富但还达不到尽善尽美的人,如同只知道尽善尽美而不知真理为何物的人一样,都是人格构建上的缺陷。所以,当代青年的价值追求就不能单打一,而必须真、善、美三位一体。这样的人才是邓小平说的具有“四有”素质的新人。否则,就是“单向度的人”。所以,致成“全面发展”的圆满性方法是人的价值观构建之第二种方法。其二,也就是第三种方法,就是“工具理性”法。笔者认为,鉴于要完成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任务的历史课题,我们的价值追求应该以理性知识的追求为主,并强调学以致用,将工具理性观念进一步强化。这样才能学得一技之长,在竞争的社会站稳脚跟,在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中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

以上是时代青年人生价值构建上的三个主要方法。笔者认为,高度融合的、符合时代要求与时代理想的价值观要得以形成,必须追本溯源,在“融合”之前的“源头”上寻觅一番,不如此,崇高的价值观念、合理的价值追求、正确的价值抉择和良性的价值关系及其系统的演进则无从产生。所以,第二个问题,就是要比较分析马列主义和中国特色价值观各自赖以生成的传统文化价值哲学之背景。

二、西方价值观念侧重于人的认知需要的满足以及工具理性系统的强化

仔细考究,西方的价值观有以下几个特征:①在宇宙本体论与世界观上,西方侧重于把人的世界看成“对象性存在”,崇尚“天人有别”。西方哲学是西方价值观的最深厚的土壤,它们一开始就突出人与自然之分。并把人与自然之分看作知识和智慧的起点,人之为人的起点。《圣经·创世记》所述亚当和夏娃因吃智慧之果,懂得裸体可羞的故事,就在折射着知识来源于天人有别的西方社会文化价值哲学的倾向。②由此出发,西方人的价值追求以形而上学的问题为主,以认识论为主。在追求形而上学问题时,锻炼了西方人的理论思维能力。从中西古代哲人对宇宙本体的观点的比较中可知,西方人的抽象思维能力是较发达的。如《易经》讲线,而西方毕达哥拉斯则讲“数”;中国的史伯讲五行说,而西方的德谟克利特则讲“原子”论,赫拉克利特甚至讲逻辑斯。③在认识论上,在天人有别、主客有分的前提下,西方价值观强调主体认知能力的提高与对客体认识能力的弘

扬,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4]就是集中表达。④在强化知识价值时,西方人的价值观还呈现出突出的科学与宗教色彩。西方人认为,人的突出形象应该是理性,人应该是理性动物,德国当代哲学家卡西尔甚至认为人就是“符号动物”。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如果没有纯静的抽象的数学头脑,是看不下去的。康德晦涩难懂的《纯粹理性批判》,据说德国当时的青年结婚,康氏的大作往往是一种时髦的礼品,但只是点缀新房文化氛围的摆设,至于个中的意味则无人知晓。狄德罗从事哲学研究,上流社会的贵妇人也附庸风雅,给他一强有力的物质支持。在整个社会信仰、崇尚理性的氛围中,人便成了万物的尺度。西方的价值观就在拼命激励人用心智了解周围的世界,揭开宇宙之迷,控制万事万物,充当世界的主宰。因此,向外开拓,往前冒险,向新世界征伐,对自然界开战,便在西方获得了积极的价值评价。同时,西方价值现在崇尚知识的“绝对之探求”中蕴藏着深刻的宗教精神。这就是对形而上的执着与痴迷。形而上的存在是超验的,具有绝对性、无限性、唯一性、永恒性等。在古希腊,亚里斯多德就认为,“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而追求真理就是对神的把握。黑格尔把宇宙本体看成先于人类经验的“绝对观念”,这其实是一种精巧化的上帝创世记。笛卡尔崇尚“我思故我在”的形而上学原则,而他认为,形而上学就是研究超验的关于上帝的学说。康德认为“物自体”只能由上帝、信仰来解决把握。在知识的具体把握的方法论中,西方知识价值观认为,每一个概念、命题都力求有明确的定义和说明。每一个观点都有必要的分析和论证。现代西方哲学价值观分为两大思潮,对应于人本主义而言,科学主义思潮在大多数时间、场合下处于上风。从整体看,西方知识价值观在古代偏重于“演绎推理”;在现代偏重于“归纳证明”,但二者都不脱开逻辑式把握世界之圭臬,从而体现了一种科学精神。

三、中国人的价值观的侧重点在于人的非理性一面的构建和完善

非理性的一面主要指情和意两个子系。对应于西方知识价值观,我们可以把此称之为非理性价值观。这种非理性价值观的哲学前提表现在宇宙观上,则主张天人合一与人际和谐。所以中华人文精神的实质是“和合”二字^[5]。“合”把“天人合一”看作终极价值;“和”将“人际和谐”当成终极价值。在两层意向中,前者媒介出入与自然的关系;后者媒介出入与人的关系。然而,“天”在中国哲人那里却是一个多向性

的词汇。除了儒家经典《易经》或某些儒学大家将天看成“自然之天”,并极力劝诱人们师法自然,自强不息,健进有为外,在更多的情况下,“天”被看成了“性命之天”。故从整体上看,中国人的价值追求中倡导改造自然的情怀还是很淡化的。孟子讲“天”,主要指性命之天或“天性”之天,并具体指向人性之初的四种善端。老庄哲学中的“天”多半是“自然之天”,但它却教导人们不要妄自作为,最好的选择是“以人应天”。所以,如果说中国哲学中有处理天人关系的价值观念的话,也多半是教导人“从天而颂”,“敬天保民”,以期在肯定、认同自然的“当下”存在状态中顺天而成。庄子认为自然的都是好的,人为的则是要不得的。虽然在儒家中有一些哲人也肯定天人关系上以人为本的人的能动性的一面,诸如荀子、柳宗元、刘禹锡等。但这些闪光的思想毕竟被主流思想淹没了。儒家的天人观往往教导人向内部讨功夫,在扩充自己的善端上找切入点,目的不在于“有识于草木鸟兽之名”,孜孜于对自然的研究、体认和超越上,而在于人的身心复归以及社会的治理和人伦关系的调整上。所以,中国的天人合一的主旨还是在于通过扩充、回归善端而能在修身上有突破,通过所谓的“内圣”而达致“外王”。先处理好自身的身心与周遭的人际关系,再治理国家大事。这一模式的具体化,就是《大学》中的八纲。所以,殷忧于个人的修养与人伦教化和社会的治乱,侧重于人生哲理与道德伦理的积淀,便是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一个主旨。把这种主旨贯彻到人际关系中,便转换成了一个“和”字。“和”是一门高深的思维方法,是“中庸之道”中的基本精神。在实践中有许多操作规定:如“和实生物”的人际关系发展观;“礼之用,和为贵”的人际关系价值观;“和而不同”的自我人格保持观;“和而不流”的人际交往原则观;“仇必和而解”的社会人际关系矛盾化解方法论等^[6]。总之,这个“和”字,一是指向自我,要人们在“克己”中能够自我肯定,自我统一;二是指向他人,要公关主体能够与社会、他人达致人我和谐。在人际之和的体验中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满足。

另外,从将“天”解为自然之天而形成的天人关系上讲,既然中国人价值观念中少以人胜天的超越精神,多了一点对自然的既有状态的认同意识;那么,中国人“把握世界”的方法就不是改造的、实践的,而是想象的、浪漫的;不是革命的、激越的;而是和平的、静穆的。孟子讲“民胞物与”,即将自然界当成朋友;庄子讲至人境界,讲物我合一,讲“齐物”、“物化”,讲从整体上把握自然,并反对人为的对自然

的改造。显然,这是一种艺术化地把握世界的方法。故而大千世界在中国人的眼中,就成了“审美”的对象。这里通行的思想方法是情感的、直觉的、艺术化的、非理性的。只有靠这种方法,才能得天籁之声,享天籁之乐。所以,在艺术地把握世界中,在艺术地处理天人关系中,中国人就产生了以“乐”(如乐天、乐土、乐山、乐水等)为基线的审美方面的人文精神;正像在伦理地处理人际关系中,中国人就产生了以“礼”(礼的功能就是和)为基线的道德方面的人文精神一样。儒家的教育内容,就是主要在伦理和审美两方面考虑的。即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也就是在“尽善尽美”上下功夫。所以,理性的认知的思维方法与知识价值的追求也就多有疏忽。孔子一生孜孜汲汲追求的,据李泽厚讲,就是一种充满伦理道德与审美情趣的实践理性,如果说这也是理性的话。由于儒家不屑于从理论思维逻辑层面来构建体系,著书立说,所以《论语》一书才有郭沫若的点评,即“发言的先后次序尤其混淆了”^[7]。这是孔子的“不为”,不是孔子的“不能”。

四、简单的比较

据上面所讲,可以看出,中国人的价值观的主旨在于向善与求美,也就是孔子在《论语》中讲的“尽善尽美”的境界;对于自然界的体认则较为淡化,即求真的情怀不够。诚如张岱年概括的,“为求知而求知的态度,在中国哲学家甚为少有”^[8]。儒家教育思想中的养成目标里“君子”,“君子”当然也要体认自然,甚至要学会骑马、驾车、射箭等,但君子养成的主要功夫是人事的谄练与娴熟。正像《红楼梦》里讲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那些晋级加官的士人,往往是些巧于应付之徒。因而,谁谄练以“礼”为指归的修养工夫并因此而飞黄腾达者,往往会受到世人的钦羨;同时,那些浸淫在山水之间,寄情于自然渊薮中的文人雅士,迁客骚人,乃至至情至性的书画大家也往往受到人们的青睐,因为后者在审美方面有不斐的成就。相反,执着事业,甚至将专业当主业,孜孜汲汲于探研自然机理的人士往往得不到重视。张衡的价值旨趣是“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伙,而耻智之不博”^[9]的以德济智的事功主义倾向为主的知识(古代“智”即“知”)价值观并不被看好。他钻研地动仪,但拙于人事上的应付,史家称他是“辄积年而不徙”。行文中有几份惋惜,但也不乏些许讥讽。总之,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优良之处在于它的伦理审美两方面,在伦理上它认

为“礼之用,和为贵”,人际和谐就成了最高目标,这种和平情怀,时至今日仍闪耀着光辉。在审美上,它以直觉的情怀把握自然,在把握中不是否定自然,而是回归自然,以天人未分、乐天知命、随遇而安的原始混沌的境界为美,其中的生态意识对当今世界的环境治理不无启发。但她的短处则是工具理性的一面不足。相比之下,西方价值观念则具有理智性、谋事性、超越性、科学性、宗教性、逻辑性、外指性等。

五、近现代中国人价值观念 嬗变轨迹之回眸

众所周知,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先进的中国人在价值观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总的趋势是对自己的扬弃和对西方的认同。“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人价值观念根本嬗变的历史契机。随着帝国主义侵略不断加深,在武力征服、战争渔利、强权政治、霸权主义大昌其道中,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礼乐精神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自易白沙明确提出打倒孔家店以来,坚持“孔家的人生”(梁漱溟语)的人凤毛麟角,毛泽东在探讨传统文化中(据说他阅读过77种古代经典名著)超越了它。一部《共产党宣言》,毛泽东只取了四个字,即“阶级斗争”。“斗争”、“对抗”、“不妥协”等范畴在他的哲学思想中占有很高地位。这是一种历史的具体的和明智的选择。因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在帝国主义把刀架在中国人民脖子上的救亡图存的危机关头,给侵略者讲儒家经典只能显得迂腐与可笑。然而,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比国民党更具有文化上的自信力。因而也比国民党更具综合创新的能力。一旦稍有可能,便寻觅着自力更生、光复旧物、弘扬传统的价值观中的合理内核的机会。譬如到了延安,中国共产党在超越传统中更进一步试图向传统回归。梁漱溟去延安与毛泽东长谈,使毛泽东的民族观念进一步强化,毛讲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特点,是将“民族的”放在“科学的”、“大众的”两个概念之先的。他还将那些言必希腊罗马而不知老祖宗的文风称为“党八股”,言钟情这种文风者为“山涧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八年抗战胜利后,包括冯友兰在内的许多国学大师们的文化自信力得到了极大的振奋,冯氏甚至将“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作为自己的使命。然而,从50年代开始,我们在“一边倒”向苏联学习中,又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多有疏忽,甚至发生了大革传统文化命和“资产阶级命”的十年浩劫。三中全会以后,

我们又开始了价值观念上的新的“轮回”。先是 70 年代末华国锋“洋冒进”中对西方器物文化的盲目引进;再是 80 年代初期开始的对西方和包括东欧的制度文化的引进;到了后来,又热衷于价值观念上的讨论。总的倾向是挖掘所谓的民族劣根性的时候多,一味认同西方价值观念的多。历史的经验、教训充分证明了:什么时候我们偏执于一隅而不思在文化价值观念上来一个综合创新,什么时候革命就遭挫折,建设就遇困难,改革就临风险;相反,什么时候能够综合创新(融会贯通),什么时候我国社会与人的发展便呈现出良性演进的局面。

六、我们应该构建怎样的价值观

年近期颐的张岱年先生说:总结 20 世纪的 100 年实践,“国粹主义”的尊孔复古已经失败了;民族虚无主义的“全盘西化”也证明是走不通的;只有主动选择,学习吸收,自我更新,既学习世界先进文化,又保持并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为道路才是唯一正确的创造中国现代新文化之路。沿着这条道路,到 21 世纪,中国的前景是光明的,中国文化的前景也是光明的。张先生实际上从总的方法上指出了当代青年的价值定位必须走文化会通之路的道理。

之所以要走“文化会通”之路,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当前的国际形势与大时代特征的使然。邓小平认为,当今的时代是和平发展的潮流占居主导的时代。如果说“发展”的时代特征昭示着生产力方面的动向,属于经济层面;那么,“和平”的时代特征则昭示着生产关系乃至上层建筑方面的动向,属于政治的层面。又由于邓小平特别强调“发展”,所以,时代青年的价值抉择或定位有以下几个重点:第一,我们要追求科学、理性的价值观,以此图谋“发展”。故应将价值追求的重点定位在“主体能力”(特指“谋事”的能力)的提高上。为此,要从三方面入手:一是追求知识,博览群科,“邃密群科济世穷”。二是乐于交往,崇尚流动。即自致成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三是强化操作,不忘动手。也就是说,在“谋事”上我们要掌握新本领。例如外语、电脑、驾车等操作方面的技能我们就不能太陌生。第二,我们也要追求民族的、爱国的价值观。延安时代,毛泽东老师徐特立对毛泽东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观的次序进行了新的排列,将“科学的”放在前面,我认为很有道理。徐老认为:“科学是国力的灵魂,同时又是社会发展的标志”。然而,科学无国界,科学的主体有民族。所以,

我们还要强化邓小平的国权、国格意识。从中华民族文化价值哲学观念可以看出,中国人的做人的哲学是高深的,西方许多大师如伏尔泰、罗素、池田大作、汤比因都是“做人”学问养成上的“全盘化”论者。1986 年 76 位学者(获诺贝尔奖的)在法国巴黎开会一致认为,当今的世界在许多方面存在问题,就解决问题(尤其是政治问题)的思维方法讲,该向 2000 年前的东方孔子求教。这就说明用富含民族特性的主体文化心理素质(中国人文化价值哲学的功能状态)弥补唯“主体能力”造成的不足是非常必要的。邓小平的国权、国格意识中有两种精神,一是对内讲,即为凝聚和谐的爱国情愫;二是对外讲,则是“群而不党”的天下情怀。如果说第一点中的三要点体现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谋事气魄;那么第二点则体现了“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泱泱大国的做人气度。第三,我们还要追求竞争、开拓的市场经济价值观。因为现在是市场经济,过去在革命时代里讲革命、斗争,那么,在经济建设价值观中我们也不要草率地“告别革命”,因为当年革命正以竞争的新形式表现出来。为此,应抓住三点,一是崇尚开放,开放是发散的,不是收敛的,只有开放,才有比较,才有反差,才有危机,才有压力,才有动力,才有愤懑,才有奋进。孔子也讲知耻近乎勇。二是锐意进取。竞争是为了争取,包括争地位、争待遇、争前途。但这种争不是横向式的相互剥夺,更不是欠少规则的巧取豪夺,而是凭“实力政策”的一种人格的价值实现程度上的竞争与进取和较量。所以,我们反对你死我活,反对个人本位,反对资本主义式的“原子人格”,主张竞而不争,主张内和外争,主张大河有水小河满,主张先奉献,后索取;多奉献,少索取;奉献优,索取平。当然,也不能讲唯心主义。如果能形成人的价值上的以优对优的良性循环系统,则是再好不过的了。三是适应流动。适者生存,此为竞争力的一种重要规定。在市场经济方兴未艾,产业结构日益优化,劳动力结构瞬息万变,人的社会关系不断变迁的现时代,上岗、下岗的上下流动与择这弃那的水平流动司空见惯,我们必须锻造出以变应变的健全的心态。为此,就要复合提高,做多面手,忌单打一、成单向度。既准备成功,也预备失败,失败后东山再起。第四,我们也要追求自主、创新、效能的产业工人阶级的价值观。市场经济呼唤自主意识,强化创新精神,也崇尚手段与目的、生产与消费、吃苦与享乐相统一的效能意识。而这三点,是英格尔斯所规定的“人的现代性”的三个基本方面。所以,时代青年应该在价值定位上注

意构建自己的“现代性”,在“现代性”的强化中升华出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性情怀。但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首先应该构建的主体性应是现代性特质,这是人的主体性演进中的唯物主义。在现代性的养成进程中,工人阶级是现代化社会中最具彻底革命性的阶级,从中国近现代的革命与建设的历史来看,工人阶级的现代性构建是走在农民阶级和其它社会阶层的前头的。尽管建国后受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的影响,“老国”人的现代性构建历史一波三折,然而,新时期二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一旦转换机制,进行体制改革,焕发了生机与活力的工人阶级,其现代性状况依然是当代中国人致力于人的现代化的路标。大学生是未来产业工人阶级大军中的生力军和较有新知的一群,理应在价值观的构建上接受党的领导,向工人阶级看齐,以涉身现代企业制度为特征的大公司,在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摔打、磨砺为方法,在经济建设的实践中累积现代性特质。如果说第三点是对“谋事”价值观念的具体化;那么,第四点则是对“做人”价值观念的具体化。

总之一句话,我们要完成人的价值观念建构上的否定之否定。总的说来,中国古代以礼乐为基线的价值观念重在“做人”上。这是中华人文精神的基核,时至今日亦闪耀着真理的光辉。但真理再向前迈一步也会变成谬误。正像老舍等人所讲的,任何文化过于绵长深厚成熟也会生出些许“毒素”。这种偏颇在于它的伦理中心主义、泛和谐主义和宗法礼教色彩以及反竞争、非竞争的中庸之道中的糟粕。这点在以救亡主题为主的近现代革命史上尤为显得落伍;西方价值观念重在“谋事”上,这导致西方的进步,尤其是物质文明的突飞猛进。然而失去前现代人文理想与“做人”规范的“谋事”,也带来了误区与灾难。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二战后的环境问题、生态问题的日益严峻就是明证。所以,正确的抉择应该是“做人”与“谋事”的统一上。就做人方面讲,我们不必像陈独秀那样摈弃自己的优势而认同西方的所谓“兽性主义”,我们应该像西方的许多有识之士等对东方前现代人文理想的回归和世界商业精神向儒家文化范型回归充满着期待一样,也对自己的文化要充满自信,尤其要对传统文化基础上生长出来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的价值观充满自信;同时,也要强力“谋事”。西方文化价值哲学的长处就是在此点

上,所以,我们也要学习西方的“有益文化”,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只有这样,人的世界和世界中的人才是一个理想的状态。总之,要发展,就需要“谋事”,从生产力与社会的发展上着眼,磨砺我们的新本领;要和平,就需要“做人”,从上层建筑,尤其是政治文化发展上着眼,汲取我们的老传统。它们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首先,“做人”是“谋事”的政治凭借;其次,“谋事”是更好地当人、做人的物质基础。失去了“谋事”的“做人”难免软弱可欺,被动挨打;失去了“做人”规范的“谋事”,也可能会干出许多不是人干的勾当,从而将灵魂交给魔鬼,并带来灾难。当然,一部世界近现代历史告诉人们:“做人”与“谋事”在过去的岁月里是分开的。中国人擅长“做人”,但由于文化早启,理性早熟又显得不太进取,结果坐失大好时机;西方人擅长“谋事”,但由于理性有余而感性不足,也使“人事”产生了“异化”。历史教训昭示着当代人:为了消除历史误会以达到“双赢”,惟一的选择就是致力于“跨文化的沟通”与融合,在“做人”上向东方看齐,在“谋事”上向西方求教,这种纳异进取、文化会通,既能“干为俊杰”,又能“学习好人”的“全面发展”的人,才真正是新世纪里的合格的建设者与接班人。

参考文献:

- [1] 学习中共十五大文件问答[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13—14.
- [2] 杨启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程[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39.
- [3] 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徐特立文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319.
- [4] 辞海.哲学分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514.
- [5] 宋太庆.中国时代·二十一世纪大预言[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231.
- [6] 杨立武.和谐天下·儒学与现代公关[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6—14.
- [7] 戴生岐.一部沉实而致用的力作[N].西安:西安晚报,1995-11-25(4).
- [8]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7.
- [9] 罗国杰.中国传统道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402.